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维度： 必然性、显示机制与发生机制

缪德刚 张彩云 龙登高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制度基础、中心任务、发展目标等方面不同于人类文明史上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形态，是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出的人类现代化道路新方案，其实践经验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近代以来人均GDP和人口数量的阶段性变动数据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产业结构变动数据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示机制；劳动力在各产业的投入变动数据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验是：在完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通过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释放国民经济生产力；立足中国的比较优势促成中国式现代化。定量经验分析对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来路、把握其未来的走向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均GDP；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劳动力投入

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5.03.002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与特性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①的重要论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强调“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③。

“中国式现代化”从内涵、性质、模式和前景等方面高度概括了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性，一经提出便成为学界探索的焦点。既有讨论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路径，二是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三是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道路。综括来看，已有成果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探讨的方法论集中于定性描述基础上的逻辑演绎，而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逻辑归纳相对少见。

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实现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是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分析要素。其一，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了从低水平均衡到加速积累，再到转型起飞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转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1840年至今的人均GDP和人口数量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国民经济核算思想的生成、转型与当代价值研究”(24BJL009)。

作者简介：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836; ndg2016@126.com);张彩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836; zhangcaiyunlisa@163.com);龙登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dglong@tsinghua.edu.cn)。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16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页。

阶段性变化,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其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人均GDP持续增长的保障。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这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型。这种变化不仅直观地展示了现代化的进展,而且也是现代化成果的体现。其三,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直接结果,它体现了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机制,因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技能培训的加强,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这种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且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的表现,这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已有定性研究相当充分,但定量经验分析能够更直观、具体地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变革路径。有鉴于此,需要以经济发展水平变动为切入视角,利用近代以来人均GDP和人口数量的阶段性变动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借助于产业结构转变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显示机制,通过考察劳动力投入变动揭示其发生机制,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变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若要在国际视野下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须选择全球各国均可比较的指标,下文将围绕人均GDP和人口数量这两个可比较的指标分析百余年来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据此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量化工具：人均GDP

测度经济发展水平主要采用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使得对国别发展阶段进行比较与定位的研究目的得以实现：一是实际工资,二是人均GDP。较之于运用实际工资解析长时段经济发展水平变动而言,运用人均GDP评判长时段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的成果更为丰富,方法更为成熟,结论相对更加可靠。科林·克拉克、西蒙·库兹涅茨和安格斯·麦迪森等人或关注过中国历史上的国民经济估算问题,或直接估计了中国的国民经济指标数值,相关成果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除此之外,20世纪30、40年代至今,官方机构和学者皆有关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序列数值发表,这使得采用人均GDP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成为可能。反观中国的实际工资数据,大部分时间段的数据尤其是近代时期的实际工资数据是缺乏的。人均GDP是通过GDP除以人口数量得到的,因此,与人均GDP相关的人口数量和GDP也是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两种变量。

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人均GDP还是GDP,更适合于衡量工业化生产大规模普及以后的经济表现,而对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体来说,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新增社会产出通常被新增人口数量消耗。换句话说,人口增减是相关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变动的重要表现。本部分将着重从人均GDP和人口数量两方面描述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状况。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及其核心特征

1. 准备阶段：低水平均衡(1840年至1949年)

1840年至1949年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但这段时期内的社会经济调查时间序列数据是缺乏的。麦迪森曾根据刘大中和叶孔嘉、托马斯·罗斯基及其本人的早期研究,整理了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部分年份的GDP、人口数量和人均GDP(见图1)。从这组估值来看,GDP的最高值为1936年的3034.33亿国际元,最低值为1870年的1897.40亿国际元^①。人口数量的最高值出现在1938年,为51333.60万人,最低值出现在1870年,为35800.00万人。这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死亡率是中国近代

① “国际元”是一种理论上的货币计价单位,代表了一单位的货币所能购买的消费品数量。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王小鲁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人口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1840年至1949年,人均GDP不高于600国际元,最高值为1850年的600国际元,最低值为1934年的525国际元。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的人均GDP又回到了1890年的水平。

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反馈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考察当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遗憾的是,在20世纪前,中国长期缺乏出生率、死亡率的统计,直到20世纪初地区性的出生率、死亡率数据才陆续发布。葛学溥在广东潮州的调查结果表明,1917年、1918年当地的出生率为34.00‰,死亡率同为34.00‰。20世纪20年代的有关数据中,出生率最高的是1923年的河北盐山县,数值为58.40‰,其死亡率则高达37.10‰,出生率最低的是1929年山西猗氏县的16.50‰,是同类调查数据中出生率唯一低于20.00‰的数值,但死亡率却达到17.70‰,死亡率高于出生率。1931年至1933年,南京、上海、广州、北平等城市的出生率在20.00‰左右,死亡率约在20.00‰^①。与城市相较,农村出生率更高。根据乔启明对有关数据的整理,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农村平均出生率为39.40‰,死亡率达到30.00‰^②。金陵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1929年至1931年中国农村出生率为36.60‰,其中,北方为37.90‰,南方为35.60‰。同期,死亡率为25.70‰,南方为26.80‰,北方为24.20‰^③。

1840年至1949年,中国虽然出生率高,但人口增长相对缓慢,这应该是平均寿命短且死亡率高两个因素造成的。GDP变动与人口数量在大部分年份存在同频波动,以致人均GDP不高且相对稳定,该情形说明人口增加稀释了产出增长,新创造的社会财富被增加的人口所消耗,这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上限于维持生计状态。该特征与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国家面临的情况类似,这说明,1840年至1949年中国仍处于前工业发展阶段,尚未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即当时难以形成资本积累,中国处于贫困陷阱之中^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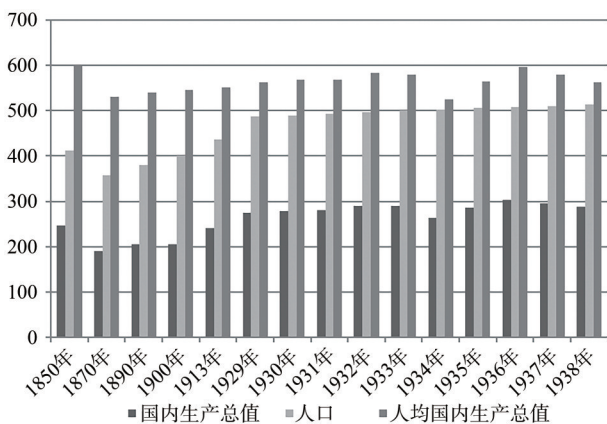


图1 近代时期中国GDP、人口、人均GDP变动(单位依次为:10亿国际元、10万人、国际元)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76页。)

2. 第一个阶段:加速积累(1949年至1978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济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受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波动较大。除1960年至1962年、1967年至1968年、1976年外,其余年份的GDP皆较上一年度

①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廖宝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1—142页。

② 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101—102页。

③ Chiao C., "A Stud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1934, 12(3), pp. 171-183, 270-282.

④ 蔡昉:《万物理论: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经济思想史学刊》2021年第2期。

有所增长,最低值为1952年的1102.44亿元人民币,最高值为1978年的5196.73亿元人民币,累计增加4094.29亿元人民币,累计增长率为371.38%,年均增长率为12.37%^①。麦迪森的估计值显示,1952年至1978年间,除1960年至1961年、1967年至1968年、1976年外,其他年份中国(不含港澳台)GDP均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最低值为1952年的3058.54亿国际元,最高值为1978年的9350.83亿国际元^②。

人均GDP方面,除1960年至1962年、1967年至1968年、1976年三个时段的数值较上一年度降低外,其余年份皆有增长。从1952年的193.76元人民币增长到1978年的543.45元人民币,累计增长率为180.47%,年均增长6.01%^③。麦迪森的估值显示,受战争因素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人均GDP较20世纪30年代明显降低,甚至不足500国际元。直到1956年,中国(不含港澳台)人均GDP突破了600国际元,达到616国际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0年。1964年至1972年人均GDP在645至800国际元之间徘徊,1973年突破800国际元,达到838国际元,1978年突破900国际元,达到978国际元^④。

1953年,新中国开始了人口普查,截至2023年先后进行了七次人口普查。结合前两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1952年至1978年间,人口数量除1960年、1961年下滑之外,其他年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人口数量最低值为1952年的57482.00万人,最高值为1978年的96259.00万人,近三十年净增38777.00万人^⑤。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麦迪森的估值皆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近代以来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约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人口数量增长了将近一倍。GDP和人均GDP增长较为平缓,个别时期还有下滑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后二者较20世纪50、60年代有相对明显的增长。这说明,尽管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制定了保障重工业发展的战略,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尚不足以抵消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对人均GDP造成的消耗。此外,值得重视的是,1949年至1969年,中国先后4次开展了扫盲运动,提高了人口识字率,与人口数量的增长相伴的是人口质量的提升,由此开启了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进程。

3. 第二个阶段:转型起飞(1978年至2012年)

这段时间,国民经济部门突破了单一所有制结构,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局面,GDP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5196.73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2年的127393.84亿元人民币,累计增加122197.11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由1978年的543.45元人民币增加到2012年的9406.00元人民币,每人年均增收253.21元人民币^⑥。从麦迪森的估值来看,197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39国际元,至1992年达到2132国际元,用了13年的时间,而人均GDP达到1997年的3013国际元用了5年的时间,尽管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人均GDP仍然在2002年达到4197国际元,用了5年的时间,人均GDP增长明显加快^⑦。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放缓。1978年,中国GDP在世界排名第11位。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96259.00万人增长到2012年的135922.00万人,三十五年间净增39663.00万人^⑧。1982年,计划生育被列为基本国策后,政策效果

① 该组数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以1987年为基期整理而得。

②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78页。

③ 该组数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以1987年为基期整理而得到。

④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78页。

⑤ 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整理而得到。

⑥ 该组数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1987年为基期整理而得到。

⑦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78页。

⑧ 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整理而得到。

十分明显,遏制了人口增长的态势,加速了人口结构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人口增长速度较快。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口增长幅度明显放缓,从1998年开始,中国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至10.00‰以内^①。

1978年至2012年,GDP与人口增长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末,GDP与人口增长相对匀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GDP增速明显快于人均GDP增速,且后者的增速较前者相当有限,这说明GDP的增长快于人口数量的增长。此外,文盲半文盲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998年的15.78%降至2012年的4.96%^②,人力资本积累持续推进。

4. 第三个阶段:高质量发展(2012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GDP由2012年的127393.8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3年的245130.18亿元人民币,累计增长了117736.34亿元人民币,累计增长率为92.41%,年均增长率为7.70%。人均GDP从9406.00元人民币增长到17374.14元人民币,增长7968.14元人民币,每人年均增收664.01元人民币,累计增长率为84.71%,年均增长7.05%^③。GDP和人均GDP在2019年、2020年出现了减缓的状况,但总体上二者仍然增长迅速,并且前者增速明显高于后者。

人口数量从2012年的135922.00万人增长到2023年的140967.00万人,十年间净增5045.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09‰^④。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放开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21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尽管生育政策一再放宽,人口数量总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其增长速度已经趋于平缓。

该时期,文盲半文盲占15岁及以上比例从2013年的4.60%降至2023年的3.43%^⑤,人力资本积累稳步向前。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的同时养育子女的成本显著提升,这降低了生育意愿。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生活成本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GDP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导致人均GDP显著提升,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GDP、人口数量、人均GDP变动情况可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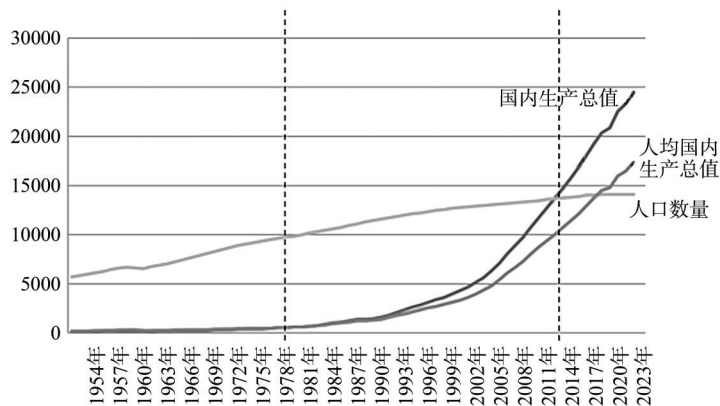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GDP、人口数量、人均GDP变动(单位依次为:10亿元人民币、10万人、元人民币)

注:数据为以1987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人均GDP。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4》。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4》。

③ 该组数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以1987年为基期整理而得到。

④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整理。

⑤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4》。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显示机制: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变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从实现社会转型的手段上说,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而工业化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因此,由工业化引发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变化是评判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一)工业化视角下的探讨:产业结构变动的含义

在一个波动的经济体中,各产业产值所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会随时间消长,因此,产业结构变化是长期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农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国民经济的核心生产部门,绝大部分经济活动也围绕农业生产展开。由于生产技术的限制,相当多的社会资源只能应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体系也是建构于农业分工之上。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农业社会生态平衡,工业生产能够将投入品转化为非同质的产出品,且其产出效率远高于农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工业取代。工业化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不断扩大市场的边界,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相关服务越来越重要并且开始创造产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容忽视的产业部门。因此,从产业结构发展史上看,既有产业部门持续完善、新产业部门不断扩展是经济发展的直观表现。

18世纪中期,通过产业结构分析社会生产、流通、分配的经济学说已经产生,如弗朗斯瓦·魁奈的《经济表》,但这些分析并未采用实际宏观经济数据。1935年,艾伦·费雪根据物质生产中加工对象方面的差异,将经济部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科林·克拉克在艾伦·费雪产业结构划分的基础上,经验分析了三大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艾伦·费雪和科林·克拉克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段内的经济变动会具体地体现在产业结构变化或者产业转移上。尽管艾伦·费雪和科林·克拉克二人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已经采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划分方式分析了有关问题,但直到1993年,这种产业结构划分方式才被明确纳入国民账户体系。也就是说,在该国民账户体系下,国民经济规模等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子账户产值的加总,三大产业数值的变动反映了相关领域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于没有按照1993年以来的国民账户体系得到的有关国民经济规模估值来说,则需要按照国民账户体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分类进行整合,这样才能够比较长历史时段的经济 development 情况。

(二)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

1. 准备阶段:一产为主(1840年至1949年)

鉴于20世纪50年代前的中国产业结构数据十分少见,基于巫宝三、麦迪森的国民经济总量估值经重新核算后能够揭示中国近代个别年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麦迪森在刘大中和叶孔嘉估值的基础上,按照1933年价格经过调整估算得到1890年、1913年、1933年的GDP。在麦迪森的估值中,第一产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分别占比68.49%、67.02%、63.97%,第二产业产值分别占比9.77%、10.39%、12.78%,第三产业产值分别占比21.74%、22.59%、23.25%。其中,第二产业中的电力业占比从无到有,即从0.00%到0.02%再到0.53%,第二产业中的现代制造业分别占比0.12%、0.62%、2.46%,第三产业中的现代运输及通信业分别占比0.39%、0.83%、1.53%^①。从麦迪森的三个估值来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巫宝三以1933年为基期计算的1931年至1936年各行业生产所得总值分别为248.08亿元、229.86亿元、204.92亿元、193.09亿元、209.78亿元、257.98亿元,第一产业生产所得分别为153.15亿元、150.94

^①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75页。

亿元、125.93亿元、113.25亿元、129.06亿元、166.41亿元,第一产业占比分别为61.73%、65.66%、61.45%、58.65%、61.52%、64.50%,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合计占比分别为38.27%、34.34%、38.55%、41.35%、38.48%、35.50%^①。以1933年为基期的1946年各行业生产所得加总值为193.25亿元,第一产业农业占比为59.41%,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合计占比为40.59%^②。1946年的各行业生产所得总值较20世纪30年代明显降低,这说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巫宝三的估值表明,20世纪30、40年代,农业产值在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约58%至66%之间,这与麦迪森的估计结果比重相仿(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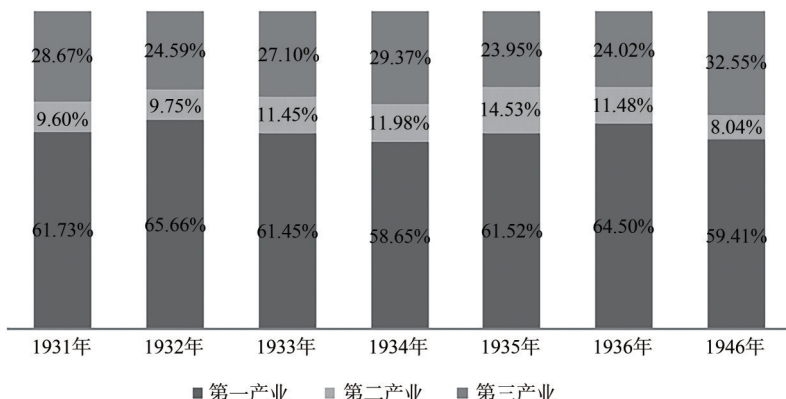


图3 1931年至1936年、1946年国民经济结构各行业比重

(数据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2期;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2期。)

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表明,当时家庭规模与土地拥有数量成正比^③。这从侧面说明,人口数量依赖于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形成资本剩余,人们通常会选择购买和累积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难以形成催生其他行业发展的资本积累。为了摆脱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的贫困陷阱,如何筹措工业资本是20世纪30、40年代讨论的热门议题之一^④。

2. 第一阶段: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1949年至1978年)

按照麦迪森的估计,以1933年价格计算1952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占GDP的55.73%、18.02%、26.25%^⑤。仅从比重方面来说,麦迪森的估值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相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名义GDP数据显示,1952年第一产业占比50.95%、第二产业占比20.89%、第三产业占比28.16%。

20世纪中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但由于资金主要用于工业建设,农业生产力提升十分缓慢,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1952年的第一产业比重是1952年至1978年比重最高的年份。1957年之后,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1958年至1960年,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降低,1960年达到最低值23.58%。1960年至1963年,第一产业比重又大幅回升,到1967年比重达到42.35%。1968年至1978年,第一产业比重再次缓慢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第二产业比重变动态势与第一产业变化态势大致相反,其比重整体上处于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2期。

② 以1933年价格计算。

③ 李景汉:《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社会学界》1931年第5期。

④ 缪德刚:《20世纪40年代中国“国民所得”估算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⑤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75页。

迅速增加的态势,尤其是重工业有脱离其他产业单方面发展的趋向。1952年,第二产业比重为20.88%,为本时期最低值。1952年至1960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引导下,第二产业比重快速增长,达到44.47%。1961年,比重下跌至31.85%。此后,第二产业比重逐渐增长,直到1978年达到本时期最高值47.70%。由于工业在第二产业中占据了绝对的地位,第二产业的变动态势主要是由工业变动决定的。

1952年至1978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1952年至1962年,第三产业占比在30.00%左右,1963年至1970年占比徘徊于25.00%,1971年至1978年占比接近23.00%。

3. 第二阶段:第三产业的显著增长(1978年至2012年)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系列措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肯定后,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伴随着产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农业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1979年,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0.70%。为保障粮食生产,中国政府调整第一产业结构,采取了鼓励种植业发展的措施。1982年,第一产业比重为31.31%,该数值为本时期最高值。1982年后,第一产业比重快速下降,1984年农产品结构性剩余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85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30%之内,1988年随着农业经营方式多样化发展带动了第一产业产值增加,但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的总趋势没有改变。1993年下降到20%之内,2009年比重低于10%,直到2012年达到本时期最低值9.11%。

1978年至2012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45.00%上下,最高值为1980年的48.05%,最低值为1990年的41.03%,这是从1988年开始解决经济过热问题造成的短期影响,1991年工业生产就已经基本恢复。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中,工业仍然是第二产业的主导部门,但轻工业产值的比重开始提高,建筑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总体上呈增加趋势。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中国政府就十分重视工业技术改造,增加技术改造投资,推动工业由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向集约型发展转型。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

较之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本时期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大。1979年,第三产业比重为22.34%;1987年突破30.00%,达到30.36%;2001年突破40.00%,达到41.22%;占比最高值为2012年的45.46%,该数值表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产值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总体上呈现走低态势,因此,这些产业之外的第三产业部门产出是导致第三产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比重得以提升的主要因素。

4. 第三阶段:结构稳定(2012年至今)

2012年,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9.11%,该数值为2012年至2023年第一产业的最高占比值。至2023年,该比重降低到7.10%,但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最低的年份为2018年的7.04%。

与第一产业类似,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部门中的比重基本呈现小幅度降低态势。2012年,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比45.42%,该数值为2012年至2023年比重的最高值。2023年,该数值降低至38.30%。本时期第二产业最低值为2020年的37.84%。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占主导地位,但建筑业发展势头迅猛。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的28.00%以上,成为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比小幅降低不同的是,2012年至2023年第三产业整体上呈现占比缓慢增长的趋势。2012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45.46%,该值为这一时期最低值。2023年该数值增长到54.60%。较之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发展较快。

1952年至2023年各经济部门产值比重变动情况可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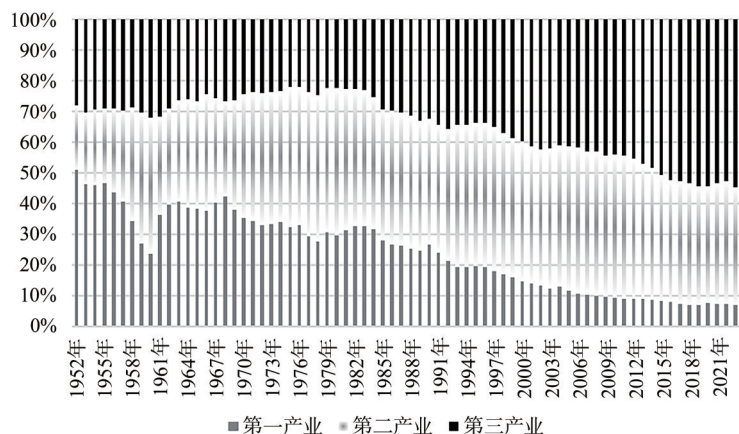


图4 1952年至2023年各经济部门产值比重

注: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除第一产业之外的产业部门为非第一产业。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1952年至2023年名义GDP)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机制:劳动力结构的阶段性变化

(一)关于劳动力投入作为分析要素的阐释:以工业化范畴

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四类基本生产要素中,土地投入相对恒定,可被视为外生因素,资本和技术是工业化前后变动较大的因素。因此,较之于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是解释长时段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因素,在解释工业化生产之前的经济变革时,资本和技术会面临解释力方面的局限。

劳动力投入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产的始终,在揭示长时段内的经济发展阶段方面,人口因素的解释力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马克思曾指出,“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①。除了经济学史上的有关论证外,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展完善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强化了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解释力。外生增长模型将人口增长视为外生因素,这是由其诞生的理论背景决定的。外生增长模型关注于解释人口数量增长率放缓乃至即将出现负增长态势、经济增长快速变动的现代增长阶段,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趋于缓慢增长的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模收益假定为常数的情境下,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人力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被放大。但事实上,由技术进步提升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而引发的人口结构转型、人口增长率下降是社会进入现代增长阶段的前提。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内生增长模型才再度将技术型劳动力要素(即人力资本累积)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统一增长理论则强化了人口因素在推进社会经济由低水平稳定状态向高水平增长方面的核心作用。即使是对一个人力资本存量相对恒定且社会经济处于高水平稳定增长状态的国家来说,人力资本存量一旦下降,至少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人力资本是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增加的,故而历史地看,人力资本形成的停滞或累积是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波动的重要变量。

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驱动因素。随着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下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上升,经济结构趋向更加合理和高效。对一个产业结构以农业为起点的国家来说,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开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最多,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又次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就业人数会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最终形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翻转的局面。如果是对同一时期的不同经济体来说,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的最不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最大,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较小,人均GDP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各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则反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近代以来就业人数呈现出由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但期间会受到社会环境、政策改革等因素的影响而有些许波动。

(二)劳动力投入变化

1. 准备阶段:集中于一产(1840年至1949年)

中国现代人口调查始于20世纪10年代,嗣后《中国年鉴》、部分省区统计年鉴、统计汇编资料等先后发布了局部地区、部分行业的就业人口数据,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仍然缺乏全国范围的人口就业数据。20世纪40年代,科林·克拉克、刘大中、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等通过计算每家人均收入乘以总人口的方法获得了“国民所得”数值,他们并没有用到行业就业人口数据。巫宝三在估算中国“国民所得”时用到了矿冶业、外籍工厂、商店店员等少数行业的就业人口数值。刘大中和叶孔嘉1965年的估算表明,1933年中国总就业人数为25921.00万人,其中,农业为20491.00万人,工业和建筑业为1923.00万人,交通和商业为2618.00万人,其他服务业为889.00万人^①。在总就业人数中,农业就业人数接近80.00%,其他服务业占比不到5.00%,劳动力集中于农业(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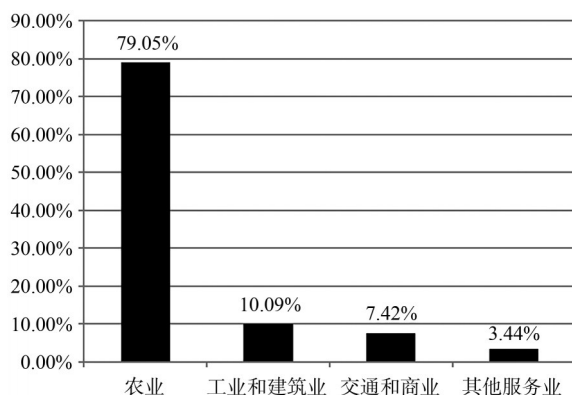


图5 1933年各行业就业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90页。)

2. 第一阶段:流向二产(1949年至1978年)

根据刘大中和叶孔嘉的估计,1952年,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交通和商业、其他服务业就业人数分别占总就业人数的77.09%、7.07%、9.73%、4.53%。1957年,前述相关行业比重为77.07%、8.00%、8.15%、4.78%^②。较之于1933年,各行业就业人数比重没有较大的变化。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③显示,195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17317.00万人、1531.00万人、1881.00万人,分别占比83.50%、7.40%、9.10%。直到1957年,各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相对稳定。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影响,农村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1958年各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为15490.00万人、7076.00万人、4034.00万人,比重为58.20%、26.60%、15.20%,在总就业人数由1952年20729.00万人增加到1958年26600.00万人的情况下,

① 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90页。

② 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90页。

③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低于1952年,直到1960年才大致恢复到1952年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水平。1959年至1961年,在城镇就业压力增大、精简城镇人口等因素影响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持续回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陆续下降。从1962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动员城镇青年下乡,各产业就业人数恢复到了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水平。

1963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为21966.00万人、2038.00万人、2636.00万人,比重为82.50%、7.60%、9.90%。1963年至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呈现下降态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呈现上升态势,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增速快于第三产业。1978年,各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为28318.00万人、6945.00万人、4890.00万人,比重分别为70.50%、17.30%、12.20%。

3. 第二阶段:流向三产(1978年至2012年)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①表明,1979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为28634.00万人、7214.00万人、5177.00万人,占比69.80%、17.60%、12.60%。自1979年到1991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持续上升。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由28634.00万人增加到1991年的39098.00万人,但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由1979年的69.80%下降到1991年的59.70%。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分别由1979年的17.60%、12.60%增加到1991年的21.40%、18.90%。1982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被确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政府不断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村发展多种经营。1982年至1991年,尽管农村就业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不断上升,但农村就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

1991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39098.00万人,到1996年,持续下降至34820.00万人。相应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由59.70%下降到50.50%。同期内,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其所占比重也不断加大,分别由1991年的21.40%、18.90%增加到1996年的23.50%、26.00%。其中,1994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需、内需双向乏力,加之为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裁汰冗员,此前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其他产业转移的局面出现了短暂的停滞。1997年至2002年,农村就业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均有微量增加,如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由34840.00万人增加到36640.00万人,但这段时期内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基本维持在50.00%上下。同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基本稳定。

2003年至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由36204.00万人持续下降至25535.00万人,相应比重由49.10%下降至31.30%,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由15927.00万人持续增加至23226.00万人,相应比重由21.60%上升至30.4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由21605.00万人持续增加至27493.00万人,相应比重由29.30%上升至36.10%,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占农村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下降。2012年,农村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与城镇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基本持平,分别为51.10%、48.89%。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27185.00万人,不仅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数22539.00万人,也超过了第一产业就业人数26472.00万人。

4. 第三阶段:第三产业为主(2012年至今)

2013年,总就业人口为76301.00万人,总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5.8%,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3838.00万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为23142.00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29321.00万人,分别占总就业人数的31.30%、30.30%、38.40%。这一年,城镇就业人口比重占总就业人数的50.49%,城镇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农村就业人口数。

继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超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后,2014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

23057.00万人超过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22372.00万人。2014年至2023年,总就业人口连续小幅度降低,城镇就业人口持续增加,农村就业人口持续下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业人数逐年下降,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增长。202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35806.00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17715.00万人,前者为后者的两倍。2023年,总就业人数为74041.00万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为16882.00万人、21520.00万人、35639.00万人,分别占就业总人数的22.80%、29.10%、48.10%。

1952年至2023年各经济部门就业人数比重变动情况可见图6。不难发现,从第一阶段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较之前阶段都有显著提升。例如,在第一阶段,通过土地改革和初步工业化,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而重工业的发展为后续的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多样化,为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优化转移提供了可能。第三阶段,通过创新驱动和消费升级,经济增长更加注重质量和可持续性,第三产业成为容纳就业人口的主要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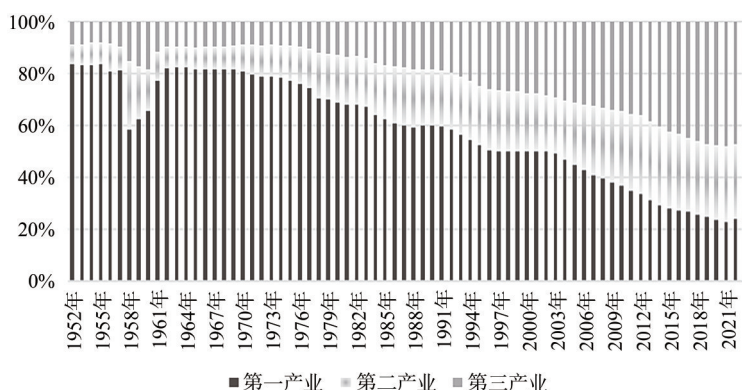


图6 1952年至2023年各经济部门就业人数比重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

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总结

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显著成就,这在世界近现代发展史上极为罕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对于那些寻求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优化产业结构,奠定中国式现代化产业基础

1949年10月,中国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通过实行以“一化三改”为主要任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国不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国家为主体通过集中统一调配使用生产要素初步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而且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重工业为中国式现代化生产体系由农业大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迈进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增长速度远高于农业,而重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工业部门。以重工业为引领,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开始加强农业生产和轻工业生产,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缩小重工业建设规模,调整发展速度,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实现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等国民经济部门的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1976年年底,中国政府恢复了各级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着力保障交通运输畅通,并整顿工业生产秩序,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发展。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体系已较为完善,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

基础,也为后续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二)把握阶段性资源配置着力点,激发国民经济活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通过一系列的重要会议,中国明确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以市场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资金主要用于工业建设领域。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最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①,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突破了计划与市场的框架,中国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价格体制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步伐。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②。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③。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七个关键领域的改革措施,旨在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④。通过这种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摆脱了高积累、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逐步转向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模式。

(三)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显著不同。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充分利用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人力资本逐步累积而实现内源性经济增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引进外国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产要素在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流动,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实现了市场化配置,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因为重工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这导致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单一所有制结构难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难以向其他产业转移,甚至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的现象。然而,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提升了技术水平,为后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建立的工业体系所需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庞大的农业劳动力的产出。

1983年,随着政策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非农产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了非农收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吸引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优化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国民经济产值的增长,推动了从产业工业化到人的现代化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民生问题愈发受到理论界关注^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卓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后,中国经济正步入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备受瞩目。在应对发展瓶颈问题的同时,推动产业升级和深化改革成为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任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9—54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4—482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08—524页。

⑤ 熊金武:《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以民生为特质》,《求索》2024年第4期。

O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Inevitability, Manifestation Mechanism, and Occurrence Mechanism

Miao Degang¹ Zhang Caiyun¹ Long Denggao²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P.R.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R.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existing modern countrie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erms of its essenc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central tasks, and development goals. Rooted in China's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model offers an innovative plan for human modernization, and for the major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is worthy of learning from its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been achieved through continuou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are the analytical elements for interpreting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irst, the phased changes in per capita GDP and population size since 1840 reveal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econd, a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dvances, t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industry declines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rises. Such change is both an obvious indication on the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a direct manifestation of its achievements. Thirdly, the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mechanism for the occurre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ecaus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train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labor force has been upgraded, which further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reveals that: (1) in the 180 years since 1840, per capita GDP surged exponentially on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after the mid-1990s; (2) The primary industry was the leading industry of China's economy before 1949. Since the early 1980s, but since the early 1980s, the proportions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exceeded that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and they have progressively increased their proportions. (3) Before the mid-1970s, most of the labor force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after which the proportion of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declin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rose relatively.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clude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national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reforming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releas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rough gradual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e quantitativ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is paper provides significant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s and potential future trajector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er capita GDP; Popul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Labor input

[责任编辑:王玲强]